

※ 研究動態 ※

饒選堂先生與臺灣的學術研究 ——香港在地學者對臺灣學術的 影響初探

楊晉龍*

一、前言

中國國民黨蔣介石(1887-1975)主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為失去大陸民心而導致軍事與政治上的失利，被迫從南京遷移到臺北；其後更因美國的強力介入與壓逼，在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戰後承諾放棄「反攻大陸」，以取得美軍的協防；尤其在一九六五年烏坵海戰慘敗之後¹，美國政府更是嚴密監控臺灣的任何軍事行動，即使到一九八七年解嚴，甚至一九九一年中止「動員戡亂時期」以後，美國政府的軍事監控依然未曾稍有鬆懈。於是國民黨政府所謂「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光復大陸，解救同胞」及「反攻大陸，收復失土」的承諾，

本文原係應邀參加2015年5月6-7日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及新亞研究所合辦的「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而寫的論文。關於該次會議的相關訊息，可參閱蔣秋華編輯：「香港經學研究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7卷第3期（2017年9月），頁1-100的報導。感謝與會學者及未具名審查委員等睿智意見的提點，使得本文的成果更為可信，訛誤也因而減至最低，謹此致謝。再者，此文係筆者執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重點研究計畫「臺灣經學研究計畫」的成果，謹此說明。

* 楊晉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合聘教授、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

¹ 參考《聯合報》記者程嘉文2015年11月14日〈他身上98處彈片傷：見證國共最後海戰〉的報導，網址：<http://a.udn.com/focus/2015/11/14/14543/index.html>，檢索日期：2018年4月30日；「維基百科」的〈烏坵海戰〉亦可參考。

只能成為安撫跟隨國民黨政府到臺灣的大陸軍民之政治性謊言。雖然實際的局勢如此，但蔣介石也確實從未放棄過「重返大陸」的任何可能性²，於是當時還被歐洲老牌帝國主義英國政府殖民下的「東方之珠」——香港，就成為蔣介石瞭解大陸局勢及指揮發動攻擊的前哨戰場。

臺灣與香港交流最先因政治而產生，但在政治的利用與局勢的操控之外，國民黨政府為了鞏固香港這個「反攻前哨站」，不僅資助香港的珠海學院，還大量招收香港學生到臺灣就讀大學，並承認香港的大學學歷。於是香港的大學教師或培養的學者，也被禮聘到臺灣³，到臺灣留學有成者也留在臺灣任教⁴，港臺兩地學術的交流，因此也就越來越頻繁，香港學者對臺灣學術的影響從而可見。此外，行政院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依據《臺灣省戒嚴令》頒布《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除中央研究院和調查局等極少數單位外⁵，居住大陸學者的著作及大陸出版的書籍，均不准公開販售或擁有，否則就會觸犯「為匪宣傳」的罪責，很可能被定罪而送到綠島管訓。於是在「戒嚴時期」那個特殊的年代，一般想要或必須閱讀大陸學者相關書籍的教師或學生，除非本身擁有「黨國」的特殊身分⁶，否則最方便者，莫過於委請外籍生或香港同學帶入⁷，這應該也是港臺兩地學術交流的另一種實

² 例如筆者在 1971-1975 年服志願役期間，軍中曾有招募志願軍到越南作戰之計畫，窺其意當是想從越南反攻進入大陸。筆者曾主動向當時的連輔導長蕭在昆先生表達志願前往之意，但因有近視眼之故，體格非甲等，因此未能被接受。審查委員提醒完整書寫長官名諱並不恰當，不過蕭輔導長至今依然與筆者保持密切聯繫，是以當不至於有冒犯之虞。感謝審查學者的提醒。

³ 就筆者所知，受禮聘到臺灣的大學教授，如：劉述先先生、吳汝鈞先生、勞思光先生等。香港培養到臺灣的學者，如：何佑生老師、柳立言教授、岑溢成教授、何廣棧教授等。

⁴ 就筆者所知，香港學生留在臺灣的學者有：李雲光教授、文幸福教授、劉少雄教授等。

⁵ 筆者 1988 年寫碩士論文需要大陸學者的相關資料時，只能委請先師張以仁教授從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影印，上面還蓋有「匪偽資料」的藍色大印章。

⁶ 例如：戲曲界大老級專家俞大綱先生，即因擁有「黨國」的特殊身分，因而可以不受約束。王秋桂先生甚至透過俞先生的協助，取得甚多大陸學者的學術研究專著；最可敬的是秋桂先生並未藏私，反而選擇其中較重要者編輯出版，嘉惠臺灣學界。另外，潘重規先生也以不同的方式，傳播大陸學者的學術。潘先生在戒嚴時代為了推廣經學，不僅免費教導《論語》，還以當時學界無法方便獲得的楊伯峻《論語譯註》為底本，寫作《論語今注》一書，此書雖當時未能實際出版，當也可見潘先生想嘉惠臺灣學界的苦心。潘先生免費教導《論語》及其《論語今注》與楊伯峻《論語譯註》的關係，可參閱山東曲阜師範大學李東峰教授 2018 年元月 12 日下午 3 點在中國文哲研究所發表的〈潘重規《論語今注》的成書及其價值的再認識〉一文所論。

⁷ 筆者 1980 年就讀臺灣大學夜間部中文系，修習樂衡軍老師的「現代小說」課程，需要閱讀魯迅

質表現。從而可知香港在臺灣學術研究上的某些重要功能。

港臺兩地學術交流熱絡關係密切的認知，當該是學界無庸置疑的共識，但除了這個理所當然的「共識」之外，似乎還未見有實際探討追索香港學者對臺灣學術實質影響貢獻的實況⁸。如果沒有實證研究結果支撐，所謂臺港學術交流熱絡，以及隨之產生的相互影響情形，當然也就無法確實地瞭解。為了彌補這個「應是而難以確認必是」的模糊認知狀態，因此設計此一研究議題，希望從實證性的「外部研究」角度，透過實際表現的「歷史分析」方式，觀察「香港本地學者」對臺灣學術研究的影響及貢獻，因而可以比較明確證實港臺兩地學術交流的熱絡及其產生的影響狀況。這對研究港臺兩地學術的研究者，例如探討香港學術傳播擴散的研究者，或者追索影響臺灣學術淵源的研究者，應該都具備了提供可信有效答案的意義與價值，甚至還可以提供香港政府單位補助學術研究之際的重要參考。這也就是設計此研究議題的主要理由與目的。

港臺兩地由於學術交流關係熱絡之故，不少學者曾在兩地的大學或學術單位擔任專職，指導研究生；以中文相關研究領域而論，例如：錢穆(1895-1990)、牟宗三(1909-1995)、勞思光(1927-2012)、劉述先(1934-2016)、何廣棧、吳汝鈞等諸先生，都有此種狀況。這類學者們對臺灣學術的影響很重要，也很理所當然，若將他們歸入臺灣學者的行列，似乎也並無不可，是以並非本文研究的對象。本文要探討的是未曾在臺灣的大學或學術單位任職，長期在香港的大專院校任教的學者。因為這類學者對臺灣學術的影響並非理所當然，研究這類學者們對臺灣學術的影響，當然也就比港臺雙棲的學者們具有更高的證據效力，因而可以更有效的證明香港學者對臺灣學術的影響作用。這也就是本文選擇香港「本地學者」作為探討對象的理由。

等 30 年代的小說作品，只能請香港同學把封面撕掉換成其他書的封面後帶進臺灣，然後請當時任職於重慶南路臺灣中華書局的歷史系李慧敏同學，下班後偷偷影印，再私下發給修課同學。

⁸ 2015 年 4 月筆者以「臺灣學術」為關鍵詞，進入香港「Timway」、臺灣「Google」、大陸「百度」、日本「YAHOO」等搜尋網站，以及「香港大學學術庫」、「港澳期刊網」；「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漢學研究中心跨資料庫檢索」、「國科會研究報告資料庫」、「華藝線上圖書館」、「臺灣全文資料庫」；大陸國家圖書館「文津搜索」、「中國知網跨庫檢索」；日本「東洋學文獻類目」等網路資料庫搜尋，未發現有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僅趙飛鵬：〈張舜徽之學術著述在臺灣的傳播及其影響〉，《成大中文學報》第 35 期（2011 年 12 月），頁 129-154 一文比較接近。

香港的面積雖然不大，人口也僅有七百多萬，但由於居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地位⁹，同時也保留傳統中國文化特別重視教育的觀點。因此現存的大專院校，就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嶺南大學、香港演藝學院、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珠海學院、東華學院、明德學院、恆生管理學院、明愛專上學院、香港能仁專上學院、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等十八所。即使僅是中文相關領域的本地學者，人數也甚多，一篇小論文自無法全面性地研究，因此必須有所抉擇。本文既是此類型研究的首篇，選擇標準必須具備較重要的代表性，於是乃選擇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大名，精通多種外語，自學成家，沒有正式學位，卻作育英才無數，堅持「求真、求是、求正」的做人與治學原則；提倡研究古典史事，必須綜合「傳世古籍文獻」、「有文字出土文物」、「沒有銘文的禮器」、「民族學的資料」、「同期域外資料」等互相參考比較的「五重證據法」；主張放棄容易造成混淆的「漢學」或「國學」之詞，以「華學」代表研究中華文化之學；並在二〇〇一年提出以經書作為推進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基礎的「新經學」¹⁰；學術研究範圍涉及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個學科門類，在許多學術領域內，都有開創性研究成果，獲得多種學術獎項，中文相關研究領域及國際漢學界，無人不知而皆敬稱為「饒

⁹ 筆者 1986 年就讀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碩士班時，時任所長的應裕康老師敦請黃永武教授演講敦煌出土唐詩的問題。黃教授演講時認為這些敦煌出土的唐詩較傳世唐詩可信，因此可以檢證世傳唐詩的訛誤。筆者以為，謂敦煌唐詩提供不同的詩作文本則可，但在沒有任何可信的資料證明之前，就認定這些不知何許人抄錄的文本，一定比世傳的唐詩文本更正確，筆者不能同意，因此當場質疑黃教授過度推崇敦煌出土唐詩資料的地位與價值。黃教授回應筆者說：「敦煌就像現在的香港，居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位置，因此流傳的文本當然較為可信。」筆者同意香港具備「居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位置」之評價，但不同意唐朝的敦煌在學術文化交流上的地位可以類比現在的香港。黃教授該次演講的內容，後來寫成〈敦煌斯 555 號背面三十七首唐詩研究〉一文，刊登於《漢學研究》第 5 卷第 2 期（1987 年 12 月），頁 547-557。黃教授對敦煌唐詩的研究狀況，可參閱黃教授的高足林聰明教授：〈論黃永武教授釀理敦煌唐詩的貢獻〉，《文學新鑰》第 14 期（2011 年 12 月），頁 19-48。

¹⁰ 參閱饒宗頤：〈新經學的提出——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國學網」，網址：<http://www.guoxue.com/xzcz/ddxz/raozongyi/xjxdtc.htm>，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30 日。

公」的饒宗頤先生(1917-2018)¹¹，作為香港本地學者的代表¹²。以饒公的學術成就，及其在香港作育英才將近一甲子的經歷，此一選擇或當不致於太過唐突。此外，筆者有幸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創立時，即成為其中一員。饒公自一九八九年即受中央研究院故院長吳大猷(1907-2000)禮聘，擔任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設所諮詢委員。饒公不僅在一九九三年書寫大字對聯「珪璋既文府；雲水淨聰明」惠賜文哲所外，擔任諮詢委員期間，對文哲所後輩更是多所厚愛與提攜¹³。這

¹¹ 以上介紹饒公在學術及其他各方面成就的說明，係參考鄭焯明、林愷欣：〈饒宗頤教授學術歷程述要〉，鄭焯明、林愷欣編：《饒宗頤教授著作目錄新編》（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頁1-6；劉慶倫、陳競新：〈饒宗頤開拓中華文化新領域〉，《亞洲週刊》第26卷第27期（2012年7月8日）等兩處相關討論而成。

¹² 黃偉豪：〈香港南來學者的經學思想：以陳湛銓及其交遊圈為中心〉，《中國學術年刊》第34期春季號（2012年3月），頁57-86曾提及香港有來自全國各地，然後定居或長期居留的學者群，這些民國以來在香港具有開創性的學者，即是本文定義下香港在地學者的一環，這就如同認定屈萬里、林尹、熊公哲、戴君仁、何定生等諸先生為臺灣本地學者的意義相同。

¹³ 舉兩個筆者親歷的事件為證：多才多藝的周純一教授，1990-1991年間以學士學歷，即經設所諮詢委員會通過，受聘為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唯一的專任研究助理。筆者當時雖已在臺大博士班就讀，但也僅能擔任每年一聘的約聘研究助理而已，可見純一兄受器重的程度。純一兄曾於1990年7月11日在國家圖書館會議廳舉辦的「第二屆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的第九場發表〈敦煌古劇質疑〉一文，宣讀論文時不小心把「嫂」的俗字「媿」看作是「梗」字，饒公和筆者當時都在場，饒公雖私下告知筆者此誤，但因擔心打擊後輩的信心，並沒有當場發言糾正。因饒公和純一兄不熟，因此乃告知當時籌備處主任吳宏一老師，請吳老師轉知純一兄。吳老師不僅告知純一兄，同時為防止類似狀況再度發生，於是要求純一兄，爾後若要發表學術論文，須先將論文送經同意後纔可發表。純一兄認為這是干涉學術研究自由之舉，憤而主動提出辭職，在1991年5月離開文哲所籌備處。關於「第二屆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的實況，可參閱汪娟：〈第二屆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紀要〉，《漢學研究通訊》第9卷第3期（1990年9月），頁160-166，涉及純一兄的報導在頁165。再則，筆者1993年曾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期發表〈神統與聖統：鄭玄王肅感生說異解探義〉一文，饒公不僅在諮詢委員會中公開讚美，還把筆者找去，鼓勵筆者繼續研究這方面的議題，並順路帶筆者到新文豐出版社，告知那些書籍可以買來看，真是讓筆者受寵若驚。雖然筆者後來並沒有依照饒公的指示，繼續探討相關的議題，但饒公的厚愛，至今不敢稍有或忘。饒公此種面對後輩訛誤不當場糾正；面對稍有成績者即當面讚美的表現，皆可見饒公的胸襟及其對後生晚輩的厚愛。饒公對臺灣學術研究貢獻的事實，就筆者所知還有一件，就是饒公會因獲知臺大中文系的吳守禮教授在整理《荔鏡記戲文》，於是在1957年贈送吳教授牛津本《荔鏡記》全套影本，使得吳教授可以更方便的對照整理。見楊秀芳：〈敬悼吳守禮教授·吳教授大事年表〉，網址：http://www.cl.ntu.edu.tw/people/bio.php?PID=143#personal_writing，檢索日期：2015年4月30日。

種難以實質討論的貢獻，筆者感受甚深，覺得有必要將饒公這種難以言宣的無形學術貢獻表出，這就是本文選擇饒公為研究對象的另一個原因，這應當也不能說與臺灣的學術無關吧。

饒公在學術上的成就無庸置疑，探討饒公學術貢獻者是以相當多，但主要都是從「內部研究」角度討論¹⁴。本文立足於「外部研究」角度，希望藉由實證的歷史分析，探討饒公對臺灣學術研究的影響，以為認識港臺兩地學術關係，以及香港學者對臺灣學術影響貢獻的狀況。依照外部研究的要求，當該全面性搜尋臺灣所有學術論著，至少應該包括：會議論文、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升等論文、學術專著、學術論文集等六大類，引用饒公研究成果為說的實際表現。這個要求固然合乎理想，但操作上確實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本文因此選擇六大類論著中較具學術指標性的學位論文¹⁵，作為此一研究議題分析的基礎。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的準確，但對一篇初步研究的論文而言，選取這類學術指標性甚高的對象，當該已具備足夠的研究代表性了。至於本文的研究方式，將充分利用二十世紀新發展的電腦網路搜尋系統功能，亦即透過臺灣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¹⁶，以及臺灣師範系統的許多大學共同建構的「師範校院聯合博碩士論文系統」¹⁷，這兩個網站收錄的自民國四十五學年度（1956年7月起）到一〇二學年度（2014年6月止）的學位論文為對象，篩選統計研究生引用或參考饒公論著為說的實況¹⁸，藉以瞭解饒公對臺灣學術界產生那些實質性的影響。研究成果除提供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參考之外，同時還希望可以經由此文研究而引發後續更多的研究，讓學界更清楚瞭解港臺學術

¹⁴ 稍舉一例言之，如胡曉明：《饒宗頤學記》（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年），頁115-117〈在學術史上的影響與地位〉之類。

¹⁵ 學位論文較具學術指標性說明的理由，請參閱張高評：〈唐宋文學研究概況〉，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頁180，以及王宏德：〈學術研究趨勢之分析與探討：以100學年度臺灣學位論文為例〉，《國家圖書館館刊》102年第1期（2013年6月），頁75-98等的相關討論。

¹⁶ 網址為：<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web.cgi/ccd=Gi.tic/webmge?Geticket=1>。

¹⁷ 網址為：<http://140.122.127.247/cgi-bin/gs/gswweb.cgi?o=d1>。

¹⁸ 某些學位論文在「參考文獻」中出現饒公的論著，但在論文正文中卻未見有實際引述的案例，如：趙惠瑜：《楊寬的中國神話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盧冠如：《比興寄託說在詞學史上的演繹與詮釋》（花蓮：東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等均有此現象。正文雖未見引述，但必然有所參考，否則當不至於列入，本文因此以「引用或參考」一詞指涉有實際引述和未有實際引述等兩種狀況，下文則以「參引」一詞表述之。

交流的實際表現，以及香港學者和臺灣學術研究的密切關係；另外則提供一種有別於以往探討學者學術貢獻的研究方式。

二、學位論文引用參考狀況

饒公固然未在臺灣任教，但卻也曾共同指導過一位研究生¹⁹，這位研究生參引饒公的論著，自是理所當然之舉，是以不列入討論。除此之外，縱觀臺灣自一九五六年開始收錄的學位論文，最先參引饒公論著的是一九七二年七月畢業於省立臺灣師範學院（臺灣師範大學前身）國文研究所戴四維的碩士論文《殷虛文字考異》，指導教授是魯實先（1913-1977），引述的是《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表示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之前，臺灣學界已知饒公的學術研究與成就。但不知是何原因，饒公論著第二次出現在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參考文獻中，卻要等到二十六年後，亦即一九九八年六月同樣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由季旭昇與鍾柏生共同指導的陳美蘭《西周金文地名研究》碩士論文；參考引述的是《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和《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等兩書。臺灣的博士研究生論文參引饒公論著，要到二十世紀最後一年的一九九九年，纔同時出現在七篇論文中：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韓復智（1930-2014）指導的李訓詳；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張永儁指導的李妍承；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黃慶萱指導的曾守正和簡宗梧指導的許秀霞；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董金裕指導的張森富和呂愷指導的吳曉青；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李豐楙指導的張美櫻等。總計二十世紀臺灣研究生博碩士論文參引饒公論著者僅有二十九位，相對於饒公的學術成就及其在國際學術界的大名，這種狀況實在有點怪異。不過臺灣的大學研究生參引饒公論著，也自一九九九年以後成為常態性的行為。這是饒公論著進入臺灣的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過程與狀況。

考察饒公論著進入臺灣的學位論文，以八十七學年的一九九九年為界，其前僅出現二篇論文參引，此後即成為常態性的參引，統觀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實際的參引狀況如下表所述：

¹⁹ 馬俊國：《楊時百與近代琴學》（臺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此論文係饒公與何廣棧教授共同指導。

各學年度參引饒公論著的學位論文數量表

學年	61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論文篇數	1	1	27	35	35	36	62	69	61	57	63	62	76	63	68	63	58	44

除之前的二篇碩士論文外，統計自一九九九年之後共有八七九篇學位論文；其中博士學位論文二三四篇，碩士論文六四九篇。從上表可見到參引饒公論著的學位論文，以九十七學年度(2008-2009)的引述達到最高峰。這些學位論文的出處，若依照現在已經合併後的大學來看，總共來自四十二所大學院校，實際的引述狀況如下表：

學位論文參引饒公論著的學校及其篇數表

學校名稱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大學	政治大學	高雄師範大學	成功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	東華大學	中興大學	清華大學	東吳大學	中央大學	輔仁大學	東海大學	玄奘大學	中正大學	淡江大學	中山大學	華梵大學	臺南大學	暨南國際大學
篇數	116	73	64	50	47	40	39	32	31	29	29	27	27	26	24	23	21	21	19	17	13

學校名稱	佛光大學	靜宜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逢甲大學	臺北藝術大學	銘傳大學	臺灣藝術大學	臺南藝術大學	嘉義大學	臺北大學	南華大學	世新大學	新竹教育大學	臺中教育大學	屏東大學	明道大學	慈濟大學	元智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	大葉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篇數	13	11	11	11	10	8	7	7	7	6	4	4	3	2	2	2	1	1	1	1	1

觀察這些學校分布的地區，遍及全臺灣北中南及東部等各地區的大學，其中參引論文數量較多的都是歷史較為悠久的大學，參引最多的前三名正與臺灣的大學排行榜相符合。這除了設校較早的因素外，很可能與這些大學國際化視野的寬廣度相關，

是以教師比較能瞭解國際學術的動態，指導教授或研究生纔有比較深的學術認識，對饒公學術成就因而較為瞭解，於是纔有較多的引述參考。若再進一步分析，則會發現師範院系的大學，包括合併後的大學，諸如：臺灣師範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東華大學、臺南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嘉義大學、新竹教育大學、臺中教育大學、屏東大學等十所共有二七九篇論文，占全部引述篇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能的因素則是師範院校的教師，絕大多數出身臺灣師範大學，而臺灣師範大學是臺灣研究生學位論文最早參引饒公論著，及參引論文數量最多的大學，是以有此自然的傳承故也。

考察這八八一位研究生出身的研究所，來自中文領域相關系所者六五九位²⁰；來自歷史研究相關系所者九十五位²¹；來自音樂藝術相關系所者五十四位²²；來自宗教哲學相關系所者四十六位²³，這是參引饒公論著較多的研究所。此外還有政治所五位；教育所三位；人類所二位；地理所二位；社會所二位；建築所二位；設計所二位；以及日本所、民族所、地質所、城鄉所、管理所、體育所、公共行政所、圖書資訊所、文化資產維護所等九個研究所，各有一位研究生的論文參引饒公的論著。觀察前述研究生出身的系所狀況，可見饒公的學術論著確實受到不同系所研究生的引述參考，由此可知饒公在學術層面上表現的多元性。

再考察八八一一篇來自不同研究所的論文，研究生指導教授的狀況，總計有四四四位教授，參與這些學位論文的指導，個別教授指導論文篇數的狀況如下：

指導教授指導學位論文篇數表

指導篇數	39篇	25篇	13篇	12篇	11篇	10篇	9篇	8篇	7篇	6篇	5篇	4篇	3篇	2篇	1篇
人數	1	1	2	2	2	1	3	2	4	5	9	18	47	79	268

²⁰ 包括：中文所、國文所、語文所、經學所、國學所、文獻所、臺語所、翻譯所、文學所、漢語文化所等。

²¹ 包括：歷史所、臺灣文化所、東亞所等。

²² 包括：藝術所、戲劇所、音樂所、舞蹈所、民俗藝術所等。

²³ 包括：哲學所、宗教所、東方人文思想所等。

這四四位論文指導教授中，指導三十九篇者為季旭昇、指導二十五篇者是王偉勇、指導十三篇者是黃文吉和蔡哲茂、指導十二篇者為林文欽與鄭阿財、指導十一篇的是許鈇輝(1934-2018)與朱岐祥、指導十篇的是陳麗桂、指導九篇的有李豐楙與許進雄及羅宗濤(1938-2018)、指導八篇的是沈寶春和邱德修(1948-2017)；指導七篇的有王文進、朱曉海、林清源、陳文華；指導六篇者為王吉林、周芳美、周鳳五(1947-2015)、徐照華、劉漢初等。若以這二十三位居前的指導教授學術專長觀之，屬於文字學類研究專長者有：季旭昇、蔡哲茂、許鈇輝、朱岐祥、許進雄、沈寶春、邱德修、林清源、周鳳五等九位；詞學專長者有：王偉勇、黃文吉、徐照華等；其他一般文學（小說、散文、文論）專長者有：王文進、陳文華、劉漢初、羅宗濤等；思想專長者有：朱曉海、林文欽、陳麗桂等；藝術專長者有：王吉林、周芳美等；民俗宗教者有：鄭阿財、李豐楙等。從這些指導教授的學術專長，大致可以瞭解饒公論著在臺灣學術界受到文字學、詞學、藝術、思想、一般文學、民俗宗教等幾方面研究學者的重視，尤其文字學範圍僅這九位教授指導的論文就有一二篇，占全數論文的 12% 以上，這應該是饒公學術較受臺灣學術界注意的研究成果。

觀察八八一篇學位論文研究探討的主要內容，若以較為粗略的標準歸納統計之，這些學位論文大致可以涵括在十七種學術研究的專業範圍之內，實際表現的狀況如下表：

參引饒公論著學位論文學術研究專業分類及篇數表

學 科 類 別	思想 類 研究	文字 類 研究	詞學 類 研究	史學 類 研究	文學 類 研究	藝術 類 研究	經學 類 研究	詩學 類 研究	宗教 類 研究	民俗 類 研究	辭賦 類 研究	文獻 類 研究	聲韻 類 研究	訓詁 類 研究	戲劇 類 研究	管理 類 研究	生物 類 研究
篇數	146	125	113	98	84	82	59	36	32	27	22	20	15	9	9	3	1

觀察八八一篇學位論文隸屬的學術專業研究範圍，可以瞭解饒公論著對臺灣學位論文的影響層面，大致以「思想類」、「文字學類」及「詞學類」等為深；其次「史學類」、「一般文學類」和「藝術類」等；再其次是「經學類」、「詩學類」及「宗教類」等。若以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觀之，「經部類」（文字、聲韻、

訓詁、文獻、經學等）有二二八篇；「史部類」有九十八篇；「子部類」（思想、藝術、宗教、民俗、管理、生物等）有二九一篇；「集部類」（詞學、一般文學、詩學、辭賦、戲劇等）有二六四篇。除「史部類」較少之外，其他三類以「子部類」最多，「集部類」次之，「經部類」又次之，但大致算是在伯仲之間，可見饒公在經、子、集等三部受到的注意相當一致，史部重視者較少。

臺灣各大學研究生參引饒公論著為說的狀況，經由上述的歸納討論，應該可以有比較清楚的瞭解。饒公的學術成就在國際上赫赫有名，臺灣學術界也早在二十世紀七〇年就有學位論文徵引饒公論著為說。但實際上整個二十世紀學位論文引述饒公論著的狀況並不熱烈，不僅只有零星的徵引，中間竟然還有二十多年未見參引的空白實況。這種現象直到二十一世紀以後，纔獲得有效的改善。從此饒公的論著即成為臺灣許多相關研究生學位論文的一部分，並且持續不斷地引導與影響著許許多多臺灣的學術研究者。然則饒公引導與影響臺灣書寫學位論文研究生的是那些論著呢？或者說，饒公被臺灣學位論文接受的論著到底是那些篇章呢？以下即根據八八一篇學位論文實際引述的篇章歸納分析之。

三、學位論文引述饒公論著之分析

饒公自一九三四年十八歲時在《禹貢半月刊》發表〈廣東潮州舊志考〉後²⁴，從此研究與創作從未間斷，直至二十一世紀未見止息。饒公雖自謙「為學貴精不貴多」，並自評說稱「觀堂」時「以精取勝」；稱「選堂」後則「以多取勝」²⁵，但實際上饒公學術多方且言不虛發，每篇論文必有他人無法企及的創見，不僅量多且質精。根據鄭煒明和林愷欣的蒐集統計，截至二〇一〇年止，饒公出版有學術著作四十六部、編纂書刊二十二部、編輯叢刊三種、主編期刊四種、詩詞集十四部、書畫集四十五部、學術論文五一三篇、賦與駢文四十二篇、散文三八八篇²⁶。不過，就學

²⁴ 王振澤：《饒宗頤先生學術年歷簡編》（香港：香港藝苑出版社，2001年），頁11說：「是目前能讀到的先生最早發表的論文。」

²⁵ 嚴海建：《香江鴻儒：饒宗頤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7。

²⁶ 見鄭煒明、林愷欣編：《饒宗頤教授著作目錄新編》之收錄。根據祁曉慶2010年7月30日的統計，則：專著86部、論文409篇、書畫集6部、詩集20部；敦煌學論著：專著21部、論文69篇。見祁曉慶：〈饒宗頤論著目錄總錄〉，「敦煌石窟公共網」，網址：<http://public.dha.ac.cn/>

術研究的角度的來看，許多被鄭、林二氏歸類為「賦與駢文」與「散文」者，同樣具有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雖然這些論文有許多被重複收錄在不同論著中，但整體而言饒公的著作確實數量龐大，同時涉及的學術研究領域也確實非常多元，因此能夠提供學界的學術資源相對的也非常豐富。以下即就八八一篇學位論文參引饒公論著的實際表現論之。

考察參引饒公論著的八八一篇論文，總共引述饒公論著一二二九種，扣除重複者則實際來自二八五種論著²⁷，實際稱引饒公篇章的狀況如下表：

學位論文參引饒公論著篇數狀況表

論文參引篇數	89	75	61	44	43	42	39	25	17	14	13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饒公論著篇數	1	1	2	1	1	1	1	1	3	3	1	4	5	3	6	2	9	6	16	18	59	141

總計臺灣研究生在學位論文中參引饒公的論著有二八五種，其中最多的有八十九位研究生稱引；其次是七十五位研究生稱引；以下依次是六十一位、四十四位、四十三位、四十二位、三十九位、二十五位、十七位、十四位、十三位、十一位，一直到僅有一位研究生稱引。受到十位以上研究生參引的饒公論著狀況如下：

研究生實際參引饒公論著狀況表

參引人數	論著標題
89 位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思想類） ²⁸
75 位	老子想爾注校證 + 老子想爾注校箋（宗教類）
61 位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甲骨類） 楚帛書（簡帛類）
44 位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²⁹

Content.aspx?id=983907320776&Page=12&types=1，檢索日期：2015年4月30日。

²⁷ 此將《老子想爾注校證》與《老子想爾注校箋》；《詞籍考》與《詞集考》等均併為一書計算，若分別計算則是 287 種論著。

²⁸ 謹依審查學者之提點，將此徵引最多的 25 種饒公論著予以歸類，感謝審查學者的提醒。

43 位	全明詞（詞學類）
42 位	詞籍考 + 詞集考（詞學類）
39 位	楚地出土三種文獻研究（文獻類）
25 位	雲夢秦簡日書研究（文獻類）
17 位	論清詞在詞史上之地位（詞學類） 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文字類） 畫鸚：國畫史論集（藝術類）
14 位	中國宗教思想史新頁（宗教類、思想類） 文轍——文學史論文集（一般文學類） 敦煌書法叢刊（藝術類）
13 位	天神觀與道德思想（思想類）
11 位	敦煌曲續論（詞學類） 選堂集林（一般文學類） 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辭賦類） 饒宗頤史學論著選（歷史類）
10 位	甲骨文通檢（甲骨類） 神道思想與理性主義（思想類） 張惠言《詞選》述評（詞學類） 楚繪書疏證（簡帛類） 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文獻類）

觀察這些被參引較多的論著，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屬於多種學科領域的叢書外，其他論著大致可粗略歸類為：文字學類（甲骨學、簡帛學）、藝術類、詞學類、文獻學類（出土文物）、宗教類、思想類（《老子》、正統思想）、一般文學類等六大類。若以傳統的四部分類觀之，饒公的研究成果無論在經部小學類、文獻學類；子部的思想類、宗教類、藝術類；集部的詞學類、一般文學類等，均有研究生徵引為說。這也是饒公眾多論著中，比較受到臺灣研究生青睞的篇章。

統觀這八八一篇學位論文四四四位指導教授的學術研究專業，主要都是在文

²⁹ 案：《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本是一套叢書，就一般正常狀況下應該明確標明實際參引的書名或篇章名，但有不少研究生卻直接將這套叢書當成一本書，例如：張家維：《殷人宗教觀：以巫術、諸神及祭祀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在前幾章直接將此叢書當作一部書引用。陳宜青：《敦煌舞的佛教藝術思想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雖在正文中一再提及饒公名諱，但卻未將實際參引的篇章標明，僅在「參考文獻」中列出此叢書。這裏即是按照這些研究生使用的實際表現統計，另外《敦煌書法叢刊》亦有相同的狀況。

字學、詞學、藝術、思想、一般文學、民俗宗教等幾方面學術領域的學者。這些論文研究的學科範圍，主要以「集部類」的研究範圍，包括詞學、一般文學、詩學、辭賦、戲劇等研究領域最多；其次是「子部類」，包括思想、藝術、宗教、民俗等研究範圍；其三是包括文字、聲韻、訓詁、文獻、經學等在內的「經部類」研究範圍；較少的是「史部類」的研究範圍。將前述指導教授的學術專業研究領域、學位論文探討內容的學科範圍，以及參引饒公論著的總體狀況等三者結合觀察，就可以瞭解饒公對臺灣學術界的影響，大致在文字學類、詞學類、藝術類及思想類等研究領域，尤其是包括敦煌、楚簡等出土文物方面的研究，影響的狀況最為顯著，這應當也就是饒公對臺灣學術界貢獻較大的部分。

除學術專業領域的影響與貢獻之外，考察這些參引饒公論著的學位論文，分別來自隸屬於中文所、國文所、語文所、經學所、國學所、文獻所、臺語所、翻譯所、文學所、漢語文化所、哲學所、宗教所、東方人文思想所、歷史所、臺灣文化所、東亞所、藝術所、戲劇所、音樂所、舞蹈所、民俗藝術所、政治所、教育所、人類所、地理所、社會所、建築所、設計所、日本所、民族所、地質所、城鄉所、管理所、體育所、公共行政所、圖書資訊所、文化資產維護所等三十七個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所；不僅含括了許多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藝術等領域的學門，更涉及政治、管理、行政、建築、設計、地理、地質、體育等等學門的學位論文。由此可見饒公學術研究成果影響範圍之廣泛，這當然也是饒公對臺灣學術界另一項重要的影響與貢獻。

四、結 論

香港在冷戰時期，不僅是退守臺灣的國民黨與大陸共產黨鬥爭的前哨地區，同時也是許多逃難的大陸學者落腳之地，更是中國傳統文化與歐美文化匯流之區，並且也是臺灣學者獲得大陸出版品的供應處；居於政治與文化等的關係，港臺兩地學術交流一直不曾間斷。關於兩地學術交流狀況的熱絡人人能講，但對於香港學者實際對臺灣學術研究的影響實情，至今依然處於模糊認知的混沌狀態。本文於是以稱名於國際學術界，且長期在香港作育英才，學界無論知與不知皆敬稱為饒公的饒宗頤先生為對象，透過最能代表學術研究指標的學位論文參引饒公論著的表現，分析饒公對臺灣學術界影響貢獻的實情，以便提供比較實際說明香港學者對臺灣學術影

響的部分實況。經由前述實證性的外部研究之後，大致可以獲得下述幾點結果：

港臺兩地學術交流一直相當熱絡，兩地學者來往也非常頻繁，許多香港本地學者和來臺留學而選擇留居臺灣者，均對臺灣學術界帶來某些實質性的影響，這應該是無庸置疑的事實。無論就臺灣本地學術形成的瞭解而言，或就國際學術交流的研究而論，港臺兩地學者在學術上相互影響的狀況，自有進行比較實際探索的必要。然而由於相關學者人數眾多，無法在一篇短文中全面性探討，是以選擇具有相當重要代表性的饒公為對象，進行初步的研究探討。

饒公自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以來，一直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大名，不過臺灣學術界一開始對饒公的認知似乎相當生疏，是以直到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纔首次有研究生參引饒公的論著，不過也僅有一位研究生徵引而已，從此以後進入沉寂狀態。直到二十世紀結束，整個臺灣學術界對饒公的學術成績，似乎缺乏應有的重視，故而在學位論文的參引表現上非常的缺乏。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饒公的學術纔受到臺灣學界應有的重視，因而饒公論著出現在學位論文的參引遂逐漸增多，並且從此成為學位論文常態性參引為說的對象。

統計二〇一四年以前完成的學位論文，總共有八八一篇或者在寫作過程中參考，或者在論文中直接引述饒公的論著；其中博士學位論文有二三四篇，碩士論文有六四九篇，這些學位論文來自四十二所大學三十七個不同學門的研究所，不僅有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等學門，同時還包括有藝術、政治、管理、行政、建築、設計、地理、地質、體育等學門的學位論文。這些論文研究的範圍來自十七個學術研究門類，總體而言，主要以思想、宗教、藝術等子部類者為多，詞學與其他文學的集部類次多，然後是文字學與文獻學為主的經部類，最後是史部相關議題的研究。這些學位論文總共參引了饒公二八五種論著一二二九次，被引述最多的專著依次是《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老子想爾注校證》、《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楚帛書》、《全明詞》、《詞籍考》、《楚地出土三種文獻研究》、《雲夢秦簡日書研究》等書。統合前述的結果，可以確定饒公對臺灣學術界的影響，不僅在文、史、哲相關系所，同時還影響到社會科學及政治、管理、藝術、建築與地理等科系。在學術研究領域上，對文字學、詞學和藝術等領域的影響特別明顯深刻，這也就是饒公對臺灣學術界影響貢獻的實情。

本文以饒公為對象，經由學位論文的引述，分析說明饒公對臺灣學術界的影響與貢獻，以作為進一步全面性探討港臺兩地學術交流，以及香港學者對臺灣學術研

究影響貢獻的初步成果。所得研究成果除可以有效說明饒公對臺灣學界的實質貢獻之外，同時對港臺兩地學術交流的瞭解，應該都可以提供某些有效的證據。因而對香港學術傳播的研究者、饒公學術貢獻的研究者，還有臺灣學術交流的研究者，應該都有某些協助研究的功能，此或即本文研究之意義與價值所在。